



# 全球替代性食物体系综述

司振中 代宁 齐丹舒

**[摘要]** 在世界各地,农业食品领域的工业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大量碳排放、食品安全危机、小农边缘化和小农生计的难以维系。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多个国家的不同群体建立了多种多样的替代性食物体系,如社区支持农业、农夫市集、共同购买、社区菜园等。替代性食物体系自2009年进入中国至今已有十年,获得了较大发展。然而,国内研究较少关注国际替代性食物体系产生的背景及理念。文章从替代食物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特征、国内外差异以及学术界的批判等几个方面进行概述,全面介绍相关的关键问题和概念,为推动国内替代性食物体系研究的发展助力。

**[关键词]** 替代性食物体系;社区支持农业;农夫市集;乡村发展;食品安全

替代性食物体系(或替代性食物网络)(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下文以AFN指代)是指在食物生产者、消费者以及食物供应链中的其他角色之间形成的有别于常规食物供应链的新的食物系统<sup>[1]</sup>。在2009年出版的《人文地理学国际百科全书》中,大卫·古德曼与迈克尔·古德曼将AFN定义为:“食物经济中一个新的快速主流化的空间”,包括激增的有机、公平贸易、本地化、高质量、地方特色食品的生产 and 消费<sup>[2]</sup>。已有研究表明,AFN与常规食物供应体系的区别主要表现在食物的生产方式、食物的属地(territorial)价值、食物价值的再分配和生产者权益的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社区和信任关系的重构、食物供应链条的本地化(food localization)以及食物系统的自我组织和管理几个方面<sup>[3]</sup>。正是这些不同才使得AFN在促进可持续的食物生产与消费、社会正义以及重建消费者信任等方面体现出独特的创新性价值。

2000年以来,国际农业与食物研究(agrifood studies)和乡村研究(rural studies)领域出现了大量关于AFN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多个角度探索了AFN的产生、内涵和发展,并对不同国家的案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此外,由于AFN与乡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国际发展和乡村发展研究领域也对AFN予以关注。目前关于AFN的研究可以归类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关于“替代性”(alternativeness)的讨论、AFN的产生机制和案例分析(包括运行原则、策略和政策环境的解读)、消费者参与AFN的动机和需求、AFN对食物系统演变、乡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以及对AFN研究的反思和批判。本文不对这些研究进行详细讨论,而是基于已有研究讨论AFN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特征、国内外AFN的差异以及学术界对其价值取向的批判。作者希望藉由本文全面介绍AFN的基本内涵、意义和发展方向,为推动中国AFN研究的发展助力。

## 一、替代性食物体系的产生和发展

### (一)类型和产生背景

按照对AFN内涵的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可以将AFN分为不同的类型。广义上来讲,所有区别

**[收稿日期]** 2018-06-09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项目“培育生态农业的发展路径:中国南京农业食物系统内的城乡交互与区域动态”(Cultivating pathways to ecological agriculture: Rural-urban interfaces and regional dynamics in the argi-food sector in Nanjing, China)的资助。

**[作者简介]** 司振中,加拿大巴尔西利国际关系学院(Balsilli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博士后;  
代宁,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  
齐丹舒,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

于常规农业的农业体系都可以称为 AFN,例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短链农业。狭义上来讲,AFN 强调的不仅仅是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同,更是食物供应渠道的创新。狭义的 AFN 主要包括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 CSA)、农夫市集(farmers' market)、共同购买(buying club)、巢状市场(nested market)、社区菜园(community garden)、租地种菜(garden plot rental)、“从农场到校园”项目(farm-to-school program)等。

AFN 是与现代常规食物供应体系相对立的替代性食物供应体系。它的产生与常规食物体系尤其是工业化农业产生的一系列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存在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西方国家的农业系统在 20 世纪通过规模化、机械化和产业化扩大生产、提高产量、增加了农业附加值。在产出大量廉价农产品的同时,农业工业化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表现在食物生产能耗的增加、土壤和水资源污染以及农田生物多样性降低等多个方面<sup>[4]</sup>。工业化农业也给现代食物供应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超市的发展延长了食物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供应链长度,增加了食品公司在食物供应中的角色和权重。食品公司取代农场主安排生产和销售计划,不断加剧土地和食品的商业化,将生产者在食物系统中逐渐边缘化。食品公司也通过市场推广改变了消费者的饮食习惯,由此造成了一系列公共健康问题。研究显示西方国家流行的高盐高糖高脂肪饮食和日益严重的肥胖症、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显著相关<sup>[5]</sup>。

## (二) 国际发展状况

因为上述问题,日本、瑞士、德国等西方国家率先于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发起了抵制农业工业化的食物运动,即替代性食物运动(alternative food movement)。此运动专注于推动可持续的本地化食物生产和消费、重新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增强小农在食品经济中的地位。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日本,替代性食物运动主要以女性主导的“Teikei”体系(意为在食物上看见生产者的脸)为主。因为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料理食物和照顾家庭的责任主要由女性承担。通过与生产者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她们逐渐形成了消费者联盟来规避食品安全风险。Teikei 体系同时建立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缩短了食物供应链,并且向孩子提供食物和农耕教育<sup>[6]</sup>。

在欧洲,AFN 的诞生与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密不可分:一方面,欧洲是生物动力农业(Biodynamic)的起源地,其反对化学农业对精细元素的单一追求,提倡对农场动植物和微生物等生命体的融合统一,例如对土壤健康的关注,这些理念为欧洲替代性食物运动提供了生态上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对于土地权利和经济结构的思考则为 AFN 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上的哲学基础。1920 年代鲁道夫·斯坦纳提出,由绝对价值主导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并提倡新的互惠性的经济关系。受其影响,一些土地运动倡导者们号召农用地的所有权应该偏向于做生物动力学农业的农户,并在土地使用的关系模式上以合作关系代替雇佣关系<sup>[7]</sup>。这不仅能够有效保护土壤的生态平衡,更能削减土地关系中的不平衡,减少大企业垄断土地使用以及边缘化小规模农户的情况。据欧盟研究统计,欧洲近 15% 的农场参与短链农业<sup>[8]</sup>。

在北美,AFN 的发展不仅受到欧洲对农民“赋权”(farmer empowerment)理念的影响,同时还从 1980 年代以来的有机运动(organic movement)中汲取力量。有机运动的主要背景是工业化食品体系带来的食品安全危机和浓厚的公民社会诉求,例如环保主义、消费者权益和动物福利等<sup>[9]</sup>。在北美这种广泛且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社会环境中,AFN 得到了快速且多样化的发展。以社区支持农业为例,不完全统计显示,1986—2009 年,美国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发展到了 2 932 家<sup>[10]</sup>。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15 年,超过 11 万家美国农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食物,总销售额超过 30 亿美元<sup>[11]</sup>。

由于公众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社区支持农业和农夫市集作为最主要的 AFN 类型近年来在国内也得到了快速发展<sup>[12-14]</sup>。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9 年首家公开以社区支持农业名义运行的农场出现以来,我国现有社区支持农业农场超过 300 家,分散于若干主要城市的生态农夫市集十几家<sup>[15]</sup>。AFN 在我国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发展,数量和规模仍远低于欧洲和美国。这主要是由于 AFN 在中国起步晚、历史短,不过中国农业人口总数高于美国和欧洲务农人口总和,以中国消费者

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农业人口向高品质食物生产转型的趋势来看,中国 AFN 发展潜力巨大。

## 二、替代性食物体系的特征

AFN 的“替代性”体现在哪些方面一直是本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sup>[16]</sup>。根据已有研究,图 1 总结了 AFN 在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四个方面区别于常规食物体系的属性。这四个方面的特征构筑了文本的讨论基础,并支撑了 AFN 与占据支配地位的工业化食物供应体系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AFN 表现出的生态性是第一个使其区别于常规食物体系的显著特征,尤其是广泛采用有机或可持续农业的生产方式以及通过缩短食物供应链条(食物里程)减少食物运输中的碳排放。生态农业通过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用生物农药和物理控虫技术取代化学农药,实现了土壤肥力的保育并减少了化石燃料的使用。通过生态农业,“自然”做为一个主体,摆脱了工业化农业中提供简单投入品的角色,被重新纳入到食物系统中。AFN 的生态性还表现在对反季食品和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的反思,和对“食在当地、食在当季”以及植物性饮食(plant-based diet)的推广。

AFN 第二个方面的替代性体现在对食物价值的再分配,即将食物价值更多的分配给小农,而不是食物价值链上的其他群体。常规食物链条中的多级经销商以及食品零售部门在食品定价中有绝对的权力并获得了食物价值的大部分,生产食品的农民则被边缘化,且只能拿到食品销售额的很小一部分。与常规食物体系不同,AFN 减少甚至完全绕过食物价值链上的中间环节,通过“短链农业”直接建立小农和消费者的联系,从而给小农提供了稳定的食品销售渠道,增强了小型生态农业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尽管在不同国家开展的案例研究发现,AFN 并不能保证本地小农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 AFN 对于小农利益的强调是其区别于常规食物体系的重要特征<sup>[17]</sup>。

AFN 第三方面的替代性特征是其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信任关系的重建。AFN 强调本地化的食物生产和消费,以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面对面接触。这种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把常规食物系统中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关系私人化为个体之间的交流。信任由此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不再依托第三方存在。这种信任使交易关系变得丰富生动,并重新“嵌入”(re-embed)当地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环境。正是这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重新连接”(reconnection)促使农业食物研究把信任作为主要的研究议题<sup>[12]</sup>。“本地化”成为了对抗工业化食物体系的阵地。地方(place)的微观政治和社会关系成为 AFN 特征研究的一个主要切入点。

第四个使 AFN 区别于常规食物体系的特征表现在政治意义上的创新,即食品市场治理机制和市场组织形式的创新。世界各地 AFN 的发展都伴随着新的社会组织的诞生,例如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的食品政策委员会(food policy council)。AFN 被认为具有颠覆现有食品供应制度的潜力。食品政治领域不同的角色在相互博弈中不断重塑着食品生产、消费和监管体制。例如,对美国 and 加拿大农夫市集的研究均发现,农夫市集为试图改变食品政策的社会活动人士提供了社交和合作的空间<sup>[18-19]</sup>。学者们也探索了新的食品政策的可能性,例如,建立机构性采购(institutional procurement)机制。AFN 在政治上的创新意义使得 AFN 的发展具有了对抗主流食物流通体系以及变革现有食物制度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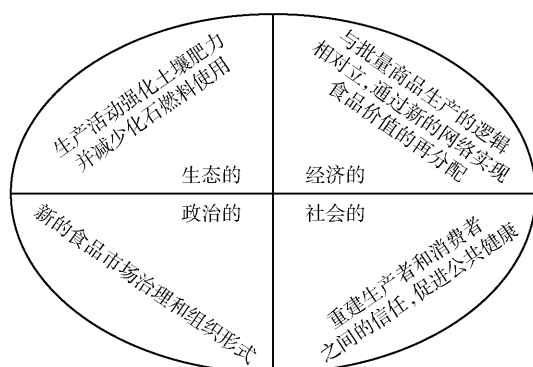


图 1 替代性食物体系区别于常规食物体系的四个主要特征

### 三、国内外替代食物体系比较研究

英文文献中关于国际 AFN 发展状况的研究十分丰富,而中国 AFN 则起步较晚。学界普遍认为,2009 年中国才出现首家以社区支持农业形式运营的农场<sup>[20-21]</sup>。在谷歌学术中以“China”和“alternative food”“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为关键词检索发现,讨论中国 AFN 的英文文献数量少于 10 篇<sup>[3,12,20-25]</sup>。在知网通过相应的中文关键词检索,可得超过百篇和 AFN 有关的文献,但是少有文献比较中外 AFN 的差异。本章节希望通过对外中 AFN 发展的比较分析更加详细地论述 AFN 的创新性和其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也为中外 AFN 彼此借鉴发展经验做铺垫。本文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比中外 AFN 的差异:缘起与诉求、参与主体及其关系以及政策环境。

#### (一) 替代性食物体系的源起与诉求

##### 1. 西方对于食物质量的多维度理解

前文提到,西方国家 AFN 受食物主权运动、环保运动与和有机食物运动等思潮影响。这些思潮和观念尚未完全融入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环境。在消费端,西方 AFN 发展也有独特的市场驱动力,即“质量转向”(a turn to quality)。具体而言,AFN 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生产者从追求食物产量和生产效率向追求食物质量和减轻环境影响转变。西方国家 AFN 的发展受追求高质量食品以外的多重价值观的驱动。对消费者而言,AFN 模式下本地地产的后工业化食物质量优于工业化食物的质量,但消费者对食物质量的感知受多重因素影响<sup>[2]</sup>。

以美国消费者在本地化食物运动中的参与为例。调查显示,消费者选择本地食物的主要原因是蔬菜新鲜度,其次为支持本地经济,再次为食物口味以及明确食物来源<sup>[26]</sup>。中国消费者获取新鲜食物途径多样。传统食物零售渠道例如流动摊贩和农贸市场提供了比超市更新鲜的食物。和中国不同,美国食物供应链经过几十年现代化进程,发展出冷链运输、冷藏储存、冷柜销售为主的零售模式。据报道,美国超市的苹果在上架销售前通常在仓库中冷藏了半年到一年<sup>[27]</sup>。对食物新鲜度要求较高的消费者需要借助农夫市集、农场自提、社区支持农业、本地共同购买菜团、社区菜园等方式获取新鲜蔬菜和水果。

##### 2. 对本地食物和小型生态农场的支持

促进本地发展、保护本地农业等是西方国家替代性食物运动的主要倡议。以美国为例,在 2000—2010 年间,美国消费者对本地食物的需求显著上涨,“土食者”(locavore)在 2007 年被牛津词典评选为年度热词。以促进本地社区发展为目的的食物消费在概念上被抽象为一种投票活动,不过这种投票方式是用现金。消费者希望通过购买本地食物和参与 AFN 的方式表达对本土小型生态农场的支持。

产地是决定食物质量的重要标准。西方 AFN 的发展伴随着对地方特色食物价值的再发现,学术界称为食物质量的“重新地方化”。以欧洲国家为例,索尼诺和马斯登指出,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为主的西欧、南欧国家,AFN 食物质量和食物产地密切相关。类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西欧国家特定地区的风土条件(terroir),如气候、地形、本土食物知识等因素成为了评价食物质量的重要标准。食物质量的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安全健康的范畴,表现出本地化、小型、环境友好、地方特色、农民个人化等多重维度。

##### 3. 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追求

多个研究指出,不同于西方,中国 AFN 从无到有的过程主要受食品安全因素驱动<sup>[3]</sup>。如果西方国家 AFN 的产生用“质量转向”(turn to quality)归纳,那么中国 AFN 的产生则是“安全转向”(turn to safety)。从 2000 年起食品安全事件在中国频繁出现。媒体关于食品安全问题接连不断的报道也损耗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监管系统的信心。学者指出,中国的食品监管部门陷入了塔西陀陷阱,即无论监管部门用何种手段验证食品的安全性,公众始终保持怀疑<sup>[28]</sup>。由此,参与 AFN 成

为获取值得信任的食物的渠道。

总结而言,西方国家 AFN 的参与者在信任和食品安全以外,表达了追溯食物产地、保护农耕环境和支持本地经济的意愿。而 AFN 在中国的产生主要因为对常规食物市场失去信任的消费者需要替代平台来重新构建信任。信任建构成为刻画中国 AFN 生产者—消费者关系的关键因素<sup>[29-30]</sup>,下面本文将讨论 AFN 中生产者—消费者关系在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不同内涵。

## (二) 参与者及其关系

### 1. 参与者的差异

纵观国内外 AFN 的发展进程,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推动替代性食物运动中独具一格。如上所述,日本 Teikei 体系主要由女性消费群体推动,欧洲 AFN 的迈进离不开社会运动家和坚持可持续农作的农民群体的工作,而环保人士、消费者组织和社会运动家则是北美 AFN 发展的中流砥柱。根据前人的研究和我们对 AFN 的探索,中国 AFN 的参与者主要是崛起的中产阶级精英。首先,作为消费群体,中产阶级对有机食品和生活方式有比较高的经济支付能力;其次,我们发现大多数生态或有机农场,包括社区支持农业农场的创办者都是“新农人”群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着较高的教育水平或资本积累。对于食品安全和环境健康的担忧以及对重建乡村、建立信任的渴望使他们投身到 AFN 的实践中。新农人群体发起的 AFN 推动了公众对食品健康和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认知,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发展,帮助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提高了收入水平并带来了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纳入中产以外的更广泛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群体是中国 AFN 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 2. 参与主体关系的差异

除了参与群体的区别之外,中外 AFN 的生产者—消费者关系也存在显著差异。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波兰尼“嵌入”概念(embeddedness)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的理论,被学者广泛用以解释 AFN 的产生机制。格兰诺维特提出不同于常规经济学的假设:交易产生于人际网络(interpersonal network)而非抽象的市场秩序。AFN 中食物的交易不只是理性人围绕食物的价值交换,还包含建立在食物生产过程和价值导向之上的群体共识和认同感<sup>[31]</sup>。这类共识和认同促进了社区(community)的建立。社区支持农业中“社区”两字,其内涵不同于中文理解的依照街道划分的空间片区,而是一个集体的概念,指社区支持农业关系网络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sup>[23]</sup>。围绕食物形成的社区内,消费者不是食物关系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同其他社区成员结成同盟,实现共同目标。在某种意义上,AFN 中的社区是公民组织,组织目标是改变小农经济困境、加快农业绿色化。这种公民运动衍生出的 AFN 经济模式,有些学者称之为道德经济。

大卫·古德曼和迈克尔·古德曼提出,北美和西欧 AFN 的理想模式满足“道德经济”的特征。道德经济中,消费者不仅购买商品和服务,而且主动承担社区责任和义务<sup>[2]</sup>。不少北美国家的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主动与生产者分担农业生产和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并在农场从事志愿服务工作。中国还缺乏这种状态运作的社区支持农业案例,主要原因是中国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以市场关系为主。中国消费者在 AFN 的参与行为以个体和家庭为基础,较少自发和生产者组成食物社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本地化食物运动、可持续消费等运动在中国并未出现同等程度的发展。群体中中国消费者参与 AFN 普遍是种个人行为,而不是抵抗食物系统工业化的群体意识。司振中等人发现,中国 AFN 的食物生产者试图推动的环境社会价值较少被他们的消费者理解。虽然不少生产者带有保护土壤、修复生物多样性、建立公平食物体系的愿望,消费者只关心食物的农药残留和营养价值,对生产者的环境和社会贡献支付意愿不强<sup>[3]</sup>。也有研究指出,生产者和消费者参与目的不同,阻碍长期稳固合作机制形成,而且两方缺乏沟通,不能有效交流传播信任和价值<sup>[21]</sup>。

### 3. 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

国内外 AFN 的诉求差异还源自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近代的西方传统基于以多元主义为

主的价值观,通过积极的参与式环境来塑造社会的组成和互动方式,强调个人主义和由此产生的多元社会团体的价值<sup>[32]</sup>。在国外 AFN 中,“群体参与”“自我决策”“公平分配”等都是构成替代性食物运动的理念,并吸引了不同的消费者团队积极的参与其中。“小而美”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流行文化中的一个要素,促使公众对于大规模工业化农业进行反思。对消费主义的反思也逐渐成为文化转向的重要内涵。这些被广泛传播的社会理念都强化了 AFN 支持小型生态农场的价值取向。而中国的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强调以集体利益和和谐为主的人际关系。消费者更习惯于以集体为主的生产和消费安排。在当前快速变化的社会中,集体诉求主要体现在对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的担忧,也塑造了中国 AFN 发展的推动力量。在“顾客就是上帝”的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消费者把自己置于高于生产者的地位,普遍歧视农民尤其是小农,增加了 AFN 推动公平贸易的困难。

总而言之,虽然 AFN 在西方的产生是为了构建一种新型的打破纯粹市场经济逻辑的经济形态,但中国 AFN 仍然遵从市场经济的逻辑。与西方消费者追求国产和本地产食品相反,在中国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主导 AFN 参与者的关系,强调食物的物美(安全)价廉(低价),追求新奇食品、进口食品,限制了生产者生态农业理念的实践。后文在针对 AFN 模式的批判性研究一章中,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不对等关系会进一步展开讨论。

### (三) 政策环境

#### 1. 国际上对 AFN 的支持

欧盟所有成员国统一实施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简称 CAP)中“改善农业环境和减少地区贫困”的改革目标和 AFN 农业食物运动相呼应。例如,CAP 要求农场必须满足交叉遵守条件(cross-compliance),良好农业和环境条件(Good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设立专项基金,统筹农村地区农业和非农经济项目。这些措施和工业化时期的农业政策不同——不只强调产量、机械化、标准化,还突出绿色生产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类似政策也出现在日本和美国。

日本政府对 AFN 尤其是本地食物运动也有政策支持。比如日本政府每五年更新的农业发展纲领“农业—粮食—农村基本计划”,将地產地销(chisan-chisho)的思想纳入农业发展目标。借此计划,日本政府鼓励学校和社会组织宣传消费本国本地食物的好处,推广本国饮食文化,普及本地食物运动对公共健康和生态系统的益处。

大部分 AFN 项目由公民社会自主发起,政府直接参与度较低,但“从农场到校园”项目在北美和欧洲大多由政府牵头。以美国为例,“从农场到校园”项目是联邦政府福利项目的延伸。“从农场到校园”项目不仅为学生的食品安全和营养提供保障,同时惠及本地的中小型农场。和美国类似,欧洲国家也有“从农场到校园”的项目。意大利罗马的项目执行比美国更为严格。罗马的学校按数量分片区,由农场和公司竞标为片区供菜,但每家公司最多只能供应一个片区的蔬菜,避免大公司垄断,为当地小农场和小型食品公司创造机会。

除了“从农场到校园”项目,政府对都市内部的社区菜园也有扶持政策。作为 AFN 的一种类型,社区菜园在北美历史久远。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和加拿大因为战争和经济萧条,城市供粮成为难题,社区菜园成为解决城市饥饿的方法。当时的城市菜地,又称为 relief gardens 即“(饥饿)解除花园”。政府通过鼓励市民在城市中种菜,缓解了失业、饥饿和贫穷等问题。美国农业局在 2009 年推出了“人民菜园”项目,资助城市社区菜园的发展。加拿大多伦多的“食物分享”组织(Food-share)同样得到多级政府的资助,在多伦多市区周边开发多家社区菜园。截至 2014 年,美国和加拿大拥有超过 18 000 个都市社区菜园。

#### 2. 国内 AFN 的支持政策

相较于西方国家政府政策对 AFN 的支持和补助,中国对 AFN 的直接支持比较罕见。我国目前已有的社区支持农业、农夫市集、农场直销、共同购买采购团等 AFN 尝试主要是非政府组织或个人自愿自费成立,政府资助主要流向规模化、集约化的设施农业,比如温室建设和农机补助,还

有大市场的流通过程如农村电商发展<sup>[22, 33]</sup>。研究发现的政府支持限于个例,比如海淀区政府对小毛驴市民农园提供的土地优惠和贵阳市在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中的“社区支持农户”提法<sup>[21]</sup>。

虽然目前中国政府对 AFN 的直接支持不多,但 AFN 的发展目标与中国政府的宏观发展计划相吻合。中国政府计划在 2020 年消除贫困。乡村发展和减轻贫困可以通过开拓符合村民利益和技能的 AFN 项目实现。例如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发起的巢状市场项目,与河北村民合作,为城市消费者提供较少化学投入品的食物,提高村民收入,改善乡村环境,同时保障了食品安全<sup>[34]</sup>。又比如,国家教育部推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帮助贫困地区学生改善膳食营养。此计划可与实验地区本地小型生态农场合作。合作关系不仅能帮助学生改善营养状况,还能鼓励本地农业生产向可持续转型,提高农民收入,减少农村劳动力流失,缓解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

## 四、学术界对替代性食物体系的批判

### (一)对“常规—替代”二元划分的批判

虽然替代性食物运动对常规工业化食品体系进行了反思,也提供了多种重塑生态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可能,学术界仍然对 AFN 及其理念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批判性讨论。一些文章讨论了 AFN 概念本身的模糊性,聚焦于“常规—替代”这一二元划分。部分学者认为“替代性”这一名称是对于常规食物体系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生产主义经济逻辑的主导地位的让步。本质上说,这些学者试图挑战以经济标准作为衡量所谓的好与坏、强与弱的唯一标准,倡议将更丰富的标准容纳到衡量新的农业生产的模式中,例如,社会公平、环境正义、食品安全、生物多样性等标准<sup>[35]</sup>。另外,学者也从更加现实主义的角度指出了“常规—替代”的模糊性还在于其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而现实中,大多数生产者和消费者在销售或购买农产品时常常采取混杂的方式:部分通过常规市场,部分通过替代性市场渠道。

### (二)对“替代性”的反思

除了对于“常规—替代”二元对立概念的批判以外,已有研究也指出,过分强调 AFN 在四个主要方面的特征忽略了不同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下,AFN 的不同案例在多种替代性维度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尤其是新近出现的 AFN 案例,并不一定表现出所有上述四个特征,反而体现出了每个特征内部更加细微的差别。因此,他们提出将这四个特征细分为八个维度来刻画具体的 AFN 案例。这八个维度又可以归为两类:食品本身的特征,包括健康(无农药、激素、抗生素污染)、生态、当地、当季;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农业生产的小型化、对社会联系和个人关系的推动、社会正义的体现和政治意义上的创新<sup>[3]</sup>。采用这八个维度来度量 AFN 的替代性凸显了 AFN 的多样化以及其在政治经济环境中的重新“嵌入”。

已有研究也对 AFN 的“替代性”本身也进行了批判性讨论,尤其是其对社会包容、社会正义和生态保护的影响。例如,有学者认为,尽管促进社会包容是 AFN 的一个主要价值取向,但是很多西方 AFN 案例的参与者都以有良好教育背景且相对富裕的白人阶层为主。关于中国社区支持农业的研究也发现中高等收入的中产阶级家庭是社区支持农业农场的主要会员群体。学界也对 AFN 的生态性以及促进社会正义的特征提出了质疑<sup>[36]</sup>,并指出,保持 AFN 的生态性与其促进社会正义的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矛盾,即小农场生产和本地化消费并不一定是更生态的选择。此外,何为 AFN 所强调的“本地食物”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即“本地”是一个特定的地理范围的界定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消费者日益多元的食品需求压力下,生态小农场如何在保证食物本地化的同时维系相对稳定的顾客群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三)AFN 的常规化与“本地陷阱”

一些学者深入探讨了常规食物体系和 AFN 的关系及其演变,并强调应该深入的把握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一方面,常规农业可以通过武装上“替代性”来为自己正名。例如,一些有机农场虽

然成功的规避了直接的环境危害和食物化学残留等问题,但仍然可能存在对生产者待遇不公以及长食物供应链的高碳排放问题。另一方面,则是 AFN 常规化(conventionalization)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议题是“本地陷阱”(local trap)。本地化生产和消费是 AFN 所强调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不仅指在物理空间上缩短食物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距离,从而减少碳排放,保证食物的新鲜和安全;还包含了在社会维度上减小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促进信任和增强消费者对 AFN 的参与感。在不断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地感、社区感和地域感的淡化,地理特征的消失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同质化,成为越来越严重的人文担忧<sup>[37]</sup>。AFN 所强调的本地化正是对于此问题的回应。“本地陷阱”则是利用了这样的保护主义地域感(defensive local)使对本地食物的追求成为新的帮助精英群体刺激消费和攫取利益的手段,而这样的“资本狂潮下的地域划分”本质上对平等、环境和分配等问题是漠不关心的,学者们因此呼吁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 AFN 及其理念,从而避免对其过于简单的解读。

## 五、总结与讨论

AFN 作为对抗常规工业化食物体系的替代性食物体系在西方得到了广泛发展并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AFN 的发展保障了食品安全、促进了生态可持续、推动了对于小农和弱势群体的社会正义。AFN 表现出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四个方面的替代性特征构筑了其变革现有食物系统的潜力基础。作为西方的舶来品,AFN 在 2009 年正式引入中国,起步晚、实践项目的数目较少,也缺乏直接的政策支持。AFN 发展的主要市场动力是城市中等及高收入家庭对安全食品的需求。虽然食物质量也是欧洲和北美国家消费者参与 AFN 的源动力,但消费者对 AFN 保护本地经济和本地农业环境有较高的认同。相比之下,消费者主动支持 AFN 生产、与 AFN 农场主共同承担环境责任和农业风险的现象在中国没有明显体现。中国 AFN 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交易活动中持有不同的价值和目标,较少以共同目标组成社区。在市场经济框架内,消费者需求主导导致生产者价值理念传播受阻。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和社会组织正通过多种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并开展了丰富的消费者教育活动,推广可持续消费和“良知消费”(ethical consumption)理念。

AFN 除了保障食品安全、促进生态可持续和小农的社会正义以外,还对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欧洲乡村社会学学者对 AFN 在乡村发展上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 AFN 是乡村发展范式由“生产主义”范式向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范式转变过程中的“开路者”和“引擎”。同时,AFN 也是新乡村发展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38]</sup>。然而,学术界对于中国 AFN 与乡村发展关系的研究还较少。中国 AFN 的发展受到了各种社会力量(例如新乡建设运动)的推动,AFN 发展如何与乡村发展的社会力量相互促进或制约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另外,AFN 的发展受到了各种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如何塑造 AFN 的发展轨迹和方向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将中国的 AFN 与西方成熟的 AFN 从多个角度进行对比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视角。除此之外,AFN 内部不同参与者之间统一价值观念的沟通建立过程,政府对 AFN 发展的影响,以及 AFN 在促进社会自组织能力建设的意义都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中国 AFN 的进一步发展除了需要消费者的理解,更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生产者追求的环境和社会公平是一种社会公共品,与中国政府的脱贫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相符。然而,政府对 AFN 的政策支持薄弱,农业补贴主要流向大规模机械化的设施农业。在中国得到发展的 AFN 农场,主要依赖于高校、非政府组织和公益基金的资助。政府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设计有助于推动 AFN 发展的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一方面,农业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务农人口减少、农业资源压缩,可能严重冲击中国农业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城市居民膳食习惯的转型导致对高质量、可信赖的食物要求越来越高。AFN 是否能够持续有效地提升农业对劳动人口吸引力、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重建生产者和消费者信任、鼓励消费者尝试环境友好的饮食习惯、提高农业政策的效率都值得学界继续探讨。



## [参考文献]

- [1] Renting H, Marsden T, Banks J. Understanding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exploring the role of short food supply chains in rur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3(3): 393 – 411
- [2] Goodman D, Goodman M K.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N. Thrift and R. Kitch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Elsevier, 2009
- [3] Si Z, Schumilas T, Scott S. Characterizing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in China.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15(2): 299 – 313
- [4] IPES-Food. *From Uniformity to Diversity: A Paradigm Shift from Industrial Agriculture to Diversified Agroecological Systems*. 2016. [http://www.ipes-food.org/images/Reports/UniformityToDiversity\\_FullReport.pdf](http://www.ipes-food.org/images/Reports/UniformityToDiversity_FullReport.pdf)
- [5] Guthman J. *Weighing In: Obesity, Food Justice, and the Limits of Capi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6] Kondoh K. The alternative food movement in Japan: challenges, limits, and resilience of the teikei system.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15(1): 143 – 153
- [7] Blackford S, Daniel A, Evans R, et al.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 teaching programme for degree students in agriculture and related subjects, 2010
- [8] Augère-Granier M. Short food supply chains and local food systems in the EU. 2016. EPRS |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6/586650/EPRS\\_BRI\(2016\)586650\\_EN.pdf](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6/586650/EPRS_BRI(2016)586650_EN.pdf)
- [9] Suutari A. *USA/ Canada-The Organic Farming Movement in North America: Moving toward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The EcoTipping Points Project, 2007
- [10] Galt R E. Counting and mapping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lifornia: contributions from critical cartography/GIS. *ACM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2007(2): 131 – 162
- [11] USDA. Direct farm sales of food: Results from the 2015 local food marketing practices survey. 2016. [https://www.agcensus.usda.gov/Publications/2012/Online\\_Resources/Highlights/Local\\_Food/LocalFoodsMarketingPractices\\_Highlights.pdf](https://www.agcensus.usda.gov/Publications/2012/Online_Resources/Highlights/Local_Food/LocalFoodsMarketingPractices_Highlights.pdf)
- [12] Wang R Y, Si Z, Ng C N, et a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ust in China's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disruption,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cology and Society*, 2015(2): 19
- [13] Shi Y, Cheng C, Lei P, et al. Safe food, green food, good food: Chinese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nd the rising middle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2011(4): 551 – 558
- [14] 陈卫平. 菜篮子革命: 中国社区支持农业典型案例.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 [15] Si Z. Rebuilding consumers' trust in food: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in China. //J. Duncan and M. Bailey, eds. *Sustainable Food Futures: Multidisciplinary Solu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 [16] Whatmore S, Stassart P, Renting H. What's alternative about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3(3): 389 – 391
- [17] Allen P. Realizing justice in local food systems.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3): 295 – 308
- [18] Alkon A. From value to values: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t farmers markets.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08(4): 487 – 498
- [19] Beckie M A, Kennedy E H, Wittman H. Scaling up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farmers' markets and the role of clustering in western Canada.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12(3): 333 – 345
- [20] Krul K, Ho P.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food: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in urban China. *Sustainability*, 2017(5): 844
- [21] 杨媛, 王习孟. 中国替代性食物体系发展与多元主体参与: 一个文献综述.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2): 24 – 34
- [22] Scott S, Si Z, Schumilas T, et al. Contradictions in state-and civil society-driven developments in China's ecologi-

- cal agriculture sector. *Food Policy*, 2014(45): 158 – 166
- [23] Schumilas T.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aterloo, 2014
- [24] Chen W. Perceived value of a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working share: The construct and its dimensions. *Appetite*, 2013(62): 37 – 49
- [25] Chen W. Perceived value in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A preliminary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nomological validity. *British Food Journal*, 2013(10): 1428 – 1453
- [26] Food Marketing Institute. *US Grocery Trend Report*. Arlington, VA, 2017
- [27] The Guardian. Just how old are the ‘fresh’ fruit & vegetables we eat? 2003, <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03/jul/13/foodanddrink.features18>
- [28] 成昕, 温少辉, 孙丽娜. 从“塔西佗陷阱”谈食品安全谣言的政府应对.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2016(6): 65 – 67
- [29] 陈卫平. 社区支持农业情境下生产者建立消费者食品信任的策略——以四川安龙村高家农户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 2013(2): 48 – 60
- [30] 徐立成, 周立. “农消对接”模式的兴起与食品安全信任共同体的重建.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59 – 70
- [31]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3): 481 – 510
- [32] 吴峻鋈. 迟到的新中国: 价值观的竞争与结构变迁. 台北: 致知学术出版社, 2016
- [33] 檀学文, 杜志雄. 从可持续食品供应链分析视角看“后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 156 – 165
- [34] van der Ploeg J D, Ye J, Schneider S.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nested, marke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China, Brazil and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12(1): 133 – 173
- [35] Gibson-Graham J K. Diverse economies: performative practices for ‘other world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8(5): 613 – 632
- [36] Hinrichs C. The practice and politics of food system localizat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3(1): 33 – 45
- [37] Feagan R. The place of food: mapping out the ‘local’ in local food system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7(1): 23 – 42
- [38] Goodman D. Rural Europe redux? Reflections on 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s and paradigm change. *Sociologia Ruralis*, 2004(44): 3 – 16

## An Overview of Critical Issues of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in the Global Context

Si Zhenzhong   Dai Ning   Qi Danshu

**Abstrac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industry around the globe has resulted in increasingly severe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arge quantity of carbon emission, food safety crisi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smallholder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ir livelihoods. To cope with these challenges, different stakeholders have initiated various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such as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farmers’ market, buying club and community gardens. After a decade since its emergence in China in 2009,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have developed into diverse initiatives across the country. However, Chinese scholars have paid relatively limited attention to its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context. This paper provided an overview of the critical issues and concepts of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in the global context through elaborations on their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alternativeness,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initiatives, and critical scholarly perspectives. The paper hopes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in China.

**Keywords**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Farmers’ market; Rural development